

# 培养“King's Chinese”：英国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兴起、理念与影响(1816—1870)\*

杨 博

**【提 要】**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在诞生之初，就充满着大英帝国的权力“规训”，它参与了中英和东西方知识的聚散和流变，建构了英国殖民活动的“神授”性，英国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先进性”，英国人的“高贵感”和英国社会的“现代性”。由此，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英文教育建构了一套影响中国人“现代”意识和中国历史进程的知识体系，为英国在亚洲的侵略和扩张争得了更多权力，并塑造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深远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和周边区域的关系。

**【关键词】**海峡殖民地 华人 英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9)06—0135—10

中国处在世界之中，但首先处在中国的周边之中，处在与周边的关系之中。我们能否完整地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可能的作为，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地域辽阔的周边的认知。<sup>①</sup>182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将其控制的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这三个环绕马来亚半岛的重要港口合并成为“海峡殖民地”。<sup>②</sup>由此，英国确立了在马来亚半岛的势力。海峡殖民地是中国的“历史的周边”，是“一带一路”战略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重要通道。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海峡殖民地区域的华人英文教育，以及它带来的知识、文化和权力对这一区域和中国的深远影响。

## 一、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文献梳理

海峡殖民地华人接受英文教育的情况，最早可以从创办英文学校人士的笔记、书信和演讲里，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青年英才项目“培养‘King's Chinese’：英国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兴起与影响(1816—1860)”(0201080303819037)的结项成果。

① 程巍：《“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及其周边”》，《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21页。

② [马来西亚]谢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闽商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页。

及英文学校的档案中了解。1818年11月11日，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sup>①</sup> 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其1823年的笔记中，记录了13名华人学生的入学时间、离校时间及其中一名学生受洗的情况。在学校1834年的毕业生档案中，有43名华人学生的去向情况。<sup>②</sup> 1855年至1941年的海峡殖民地政府报告介绍了进入英文学校就读的海峡殖民地华人学生的人数、出勤状况、学习内容、缴纳费用、受政府资助的情形和退学缘由等情况。<sup>③</sup> 这些文献是关于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早期珍贵史料，但是它们多属零星的介绍，缺乏系统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英国官员、贵族和学者开始写作和出版关于海峡殖民地的书籍，其中一些描述了海峡殖民地的英文教育情况，并表述了不同的教育观点。1894年，英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前枢密院成员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男爵（Charles Wentworth Dilke）出版了一部巡游英国殖民地的游记《更伟大的不列颠》，并在书中就海峡殖民地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只要那些〔殖民地的〕当地人不能说英文，他们就对我们时代的所有文明一无所知——也就对政治学、物理学、哲学和真才实学一无所知。”<sup>④</sup> 马来亚内务部的华人事务专员维克多·普赛尔博士（Victor Purcell）写了一本专著，其主题是批评中文与现代科学和哲学思维格格不入，倡导用英文做教学语言。<sup>⑤</sup> 虽然英文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海峡殖民地政府并不打算给所有殖民地人民提供英文教育。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在其于1907年出版的《英属马来亚》一书中，谈到了海峡殖民地华人学生竞相入读英文学校，然而受政府补贴的英文学校入学名额却很有限的情形，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政府不追求给各个阶层和每个民族的儿童提供教育，那样将会让他们无法适应他们或许不得不的生活。”<sup>⑥</sup> 在这些官员、贵族和学者的略显相悖的话语中，都充满了东方主义的偏见，他们认为只有英文才是通往现代和真知的高级语言，但不是所有阶层和种族都有权学习这种语言。因此，在海峡殖民地，大英帝国的权力决定着哪些人能够接受英文教育，而英文教育和它带来的知识成为了划分阶层和种族的工具，并制造了“高阶层”人士，如欧裔白人、马来贵族、少数商人和基督教徒的特权，大多数华人只能被固化在下层阶级中。

20世纪初之后，一些国外学者在研究海峡殖民地历史时，较为客观地介绍了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艰难处境。海峡殖民地华人学者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记录了人们对海峡殖民地政府甚少为教育投入资金的批评，也表达了对众多华人子弟无学可上的担忧。书中赞扬了印度商人卡玛（Byramjee Hormusjee Cama）在新加坡开办英文学校，免费招收中国学生就读的义举。但遗憾的是，在卡玛去世后，这所学校也停办了。<sup>⑦</sup> 英国学者康斯坦丝·玛丽·特恩布尔（Constance Mary Turnbull）在著作中详细描述了海峡殖民地学校在缺少政府资助的困境中艰难办学的历程，分析了政府出于“驯化”海峡殖民地人民、拉拢马来贵族的目的而奉行的偏重英文和马来文教育的政

①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9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2.

②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9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pp. 192–194.

③ Robert L. Jarman (ed.),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 1,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1998.

④ Charles Wentworth Dilke, *Greater Britain: a Record of Travel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ith Additional Chapters on English Influence in Japan and China, and on Hong Kong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London: Macmillan, 1894, p. 540.

⑤ Victor Purcell,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6, pp. 87–88.

⑥ Frank Athelstan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British Influence in Malay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8, p. 258.

⑦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 pp. 127–128.

策，以及这种政策对华人的不良影响。<sup>①</sup>这一阶段的研究反映，海峡殖民地政府对欧裔、马来人、华人及印度裔人的分化教育，进一步巩固了海峡殖民地不同种族的阶级区分，并且通过知识的传播阻碍了华人与其他族裔的融合。

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内外开始出现专门研究海峡殖民地教育的专著和论文，对海峡殖民地教育的背景、目标、内容和影响进行系统的阐释和研究。新加坡华人学者林彭汉（Lim Peng Han 的音译）的论文基于扎实的史料，详细介绍了海峡殖民地早期学校开办的背景、情况和教学目标。<sup>②</sup>吴莹的论文介绍和分析了海峡殖民地华人学校教授英文的情况、局限性和影响。<sup>③</sup>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罗福生（Philip Loh Fook Seng 的音译）的著作深入分析了英文教育和西方科学与实用主义教育在海峡殖民地的渗透，以及这种渗透引发的马来亚民族分裂。<sup>④</sup>王赓武的报告细致探究了海峡殖民地的“教化”所塑造的华人多重身份认同。<sup>⑤</sup>大多数学者认为，在19世纪70年代前，英国对海峡殖民地的教育采取“放任”政策，并未投入太多的资金和精力。这是因为直到1870年，海峡殖民地才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海峡殖民地的教育情况。委员会于同年发布了《殖民地教育状况报告书》，海峡殖民地政府开始对英文学校进行直接管理。1872年，海峡殖民地设立视学官，但视学官往往要兼顾管理监狱和收取税金，常常只能将一部分精力用于视学。<sup>⑥</sup>因此，很少有学者将1870年前海峡殖民地的英文教育作为研究重心。对1870年前海峡殖民地区域英文教育的关注大多散佚在学者们研究成果开篇的简要介绍中，且主要集中于史料的整理和教育政策的分析。

本文使用知识一权力的分析方法，以1870年之前的海峡殖民地区域华人英文教育为研究重心，对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产生的背景，及其教学对象、目标、内容和长期影响进行重新爬梳，发现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在诞生之初，就充满着帝国的权力“规训”。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兴起直接参与了中英和东西方知识的聚散和流变，介入了东方“现代”知识、意识与文化的建构历程，塑造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复杂的身份认同，并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和周边区域的关系。

## 二、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兴起

其实，华人到达海峡殖民地区域的足迹先于英国人。15世纪初，就有华人在马六甲定居。<sup>⑦</sup>在1641年荷兰征服马六甲时，马六甲华人已达三四百名。<sup>⑧</sup>莱特占领槟榔屿之时，华人也先后到来。据英国上校托马斯·约翰·纽博特（Thomas John Newbold）记载，1819年1月英国明古连副总督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已有华人30人。1826年海峡殖民地成立时，在海峡殖民地生活的华人已经超过1万人。<sup>⑨</sup>华人到达新家园后，开垦土地，开采锡矿，从事手工艺、

① Constance Mary Turnbull,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67: Indian Presidency to Crown Colon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23–232.

② Lim Peng Ha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oys' and Girls' Schools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786–1941*,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o. 1, 2009.

③ 吴莹：《异域与本土：近代英属马来亚华侨教育百年发展研究——兼论其对闽省侨乡教育的辐射（1840—1941）》，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8~95页。

④ Philip Loh Fook Seng,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3.

⑤ 王赓武：《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的华人教育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3期，第73页。

⑥ Lim Peng Ha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oys' and Girls' Schools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786–1941*,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o. 1, 2009, p. 60.

⑦ 王付兵：《清代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66页。

⑧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7.

⑨ 王付兵：《清代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68、71页。

商业和贸易。具有重视子弟教育传统的华人也逐步开办学堂。据史料记载，1794年就有华人学校存在。<sup>①</sup>此后，华人富商、宗亲和帮办团体不断兴办私塾、义塾和各种现代学校，教授四书五经、诗赋词章和实用技能，其目的在于“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仪之邦。”<sup>②</sup>

19世纪中叶，海峡殖民地华人意识到若想便利生活，扩大商机，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争得更多权力，必须习得官方语言——英文。因此，19世纪后半叶在新加坡设立的华英书塾、毓兰书室、养正书院、乐英书室等华人学校除了教授中文读写和儒家经典外，也教授英文。但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和马来人历来对华人学校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学校的教学思路根植于中国，是一种“外来教育”，其带来的知识会威胁殖民统治和马来传统。<sup>③</sup>在这种偏见下，20世纪20年代前，殖民地政府鲜有拨款给华人学校。海峡殖民地的《海峡时报》甚至在1865年7月13日发表文章，认为华人即使懂英文，也不可能做华人儿童的英文老师。<sup>④</sup>因此，绝大多数想学习英文的华人子弟必须到英式学校学习。

基督教会牧师是兴办英文学校的先驱。1816年10月21日，包括英国驻槟榔屿大牧师罗伯特·斯帕克·哈钦斯（Robert Sparke Hutchings）在内的七名英国人发起成立了槟城义学（Penang Free School）。<sup>⑤</sup>1818年11月11日，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一些教会学校，如槟榔屿基督兄弟学校（Christian Brothers' school）倾向于招收欧裔和欧亚混血学生，但是大部分教会学校出于传教目的，欢迎华人学生以及马来裔、印度裔学生入学。即使到了19世纪，拥有强大海上军事实力的英国在开拓殖民地，满足工业革命引发的资本对原料和商品市场的巨大需求时，也不愿纯粹诉诸武力，因为武力的征服是不稳固的，精神的征服才能让殖民地长治久安。所以，英国的传教活动总是伴随着殖民活动而来，让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有充足的理由深信，他们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地位“受之于天”。1851年，英国在伦敦水晶宫举办了一场展示大英帝国殖民地物产的世界博览会，英国牧师金斯利含着自豪的热泪发表的演说充分展示了这种信念：“对我来说，纺纱机和铁路、库纳德的班轮<sup>⑥</sup>和电报……都是我们至少在某些方面和宇宙调和一致的迹象。有个强大的神灵——我们万能的上帝在安排这一切。”<sup>⑦</sup>传教士在海峡殖民地筹办学校，不但为了传播基督教义，也为了传播这种信念，为大英帝国统治殖民地获得更多“神授”权力。但是，马来人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害怕自己的子女到教会学校学习后，会背弃原有的信仰，所以大多数马来人不愿送子女到教会学校读书。即使马来儿童入读教会学校，大都只学会基本的英文和算术，能够达到养家糊口的水平就退学了。反而是华人儿童到教会学校学习的人数较多，因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高度自信的华人家长不大在乎基督教对子女的影响，他们更加注重子女通过学习英文，使家庭获得向社会上层流动的资质。据海峡殖民地政府统计，在1864年，槟榔义学有259名学生，其中华人学生有210名，占

① Jessica Trisko Darden, Policing Young Minds: Educatio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British Southeast Asia,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 No. 3, 2019, p. 280.

②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92页。

③ 王赓武：《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的华人教育政策》，《南洋问题》1983年第3期，第61页。

④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 139.

⑤ Lim Peng Ha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oys' and Girls' Schools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786—1941,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o. 1, 2009, p. 58.

⑥ 1839年，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加拿大来的萨穆尔·库纳德（Samuel Cunard）得到了英国第一份跨大西洋信件传递合同，并在次年成立了不列颠北美皇家邮局蒸汽运输公司（British and North American Royal Mail Steam—Packet Company），运营四艘往返于利物浦——哈利法克斯——波士顿航线的蒸汽船。直到1870年，库纳德保持着大西洋两岸最快的传递速度。

⑦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 158.

总学生数的 81.1%。<sup>①</sup> 英华书院的档案中记录了 1818 年至 1843 年入学的 59 名学生，其中 55 名为华人学生。<sup>②</sup> 因此，华人学生更容易成为帝国知识的传授对象。19 世纪中期在海峡殖民地执业 18 年的英国律师詹姆士·理查德森·洛根（James Richardson Logan）就认为，华人通过西方的影响和教育，可以被柔地塑造成守法有用的公民：“没有哪个种族比他们更易于统治了。”<sup>③</sup>

在传教士所办的英文学院初具规模后，官方人士也加入了办学的行列。英国占领新加坡后，马礼逊<sup>④</sup>劝说莱弗士在新加坡建立学校。1823 年，莱弗士召开公开会议，会议批准了新加坡义学（Singapore Free School）的设计。<sup>⑤</sup> 1834 年 8 月 1 日，学校正式成立。新加坡义学的组织方式建构了英文的“先进性”。学生们可以选择在英语班、法语班、葡萄牙语班、马来语班、塔米尔语班和中文班中学习。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学生在英语班中学习。以 1865—1866 学年为例，378 名学生全部在英语班学习，其中 22 名学生也在中文班学习，没有学生在其它语种班学习，<sup>⑥</sup> 大量的政府资金投注于英语班中。即使是为中文班学生设立私人奖学金，奖励对象也不是华人学生。1864 年的莱弗士董事会报告记载，一位英国人（Mr. W. W. Shaw）建议筹措 500 元，在新加坡义学建立中文班奖学金，为那些学习中文的欧裔和欧亚混血学生提供资金，理由是“华人秘密会社造成的大量害处将会被调查，因为警察会知道它们到底在做什么，而不会像现在一样依赖一个中国佬当翻译。这个中国佬很可能是秘密会社的一员，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说出实情。”随后，一名中国绅士（Mr. Tan Seng Poh）组织中国商人捐出了 500 元，用于资助 26 名欧裔和欧亚混血学生学习中文。<sup>⑦</sup> 这一事件，说明了海峡殖民地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华人极不信任。即使华人努力学习英文，能够承担翻译工作，他们也因为“中国佬”的种族身份，很难在政府部门有一席之地，获得政治权力。

通过对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兴起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在诞生之初，就承受着帝国权力的削凿。帝国的权力“规训”加之于华人、马来土著和其他海峡殖民地非盎格鲁—萨克逊族裔，使英国殖民活动的“神授”性和英国语言的“先进性”植入他们的心中，形成新的知识。在这种“规训”过程中，英国殖民政府并非冷眼旁观，而是通过官方人士办学、设计资助方式、建议教学内容、监督教学活动等权力形式，尽可能地施加影响。1855 年，海峡殖民地政府规定，如果哪所学校不接受政府的监督，就不能接受政府的资助。<sup>⑧</sup> 翻阅历年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报告，可以发现从 1856 年开始每年的报告中，都有对于教育情况和政府投资依据的监督和分析。1863 年起，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都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官方人士、贵族、牧师、军官和工程师组成，其主要任务是组织考试，评选获得政府奖学金的学生<sup>⑨</sup>——这是以帝国的名义，遴选优秀子民。1867 年起，马六甲殖民长官作为槟榔义学的官方校长，每个月都会视察学校，不定期给教学内容提出建议。警察也会造访学校，

---

①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 1, p. 483.

②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9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pp. 192—194.

③ Constance M. Turnbull, Communal Disturbanc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857,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1, No. 1, 1958, p. 136.

④ 马六甲英华书院的筹办发起人，后来到中国传教，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

⑤ Sophia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4.

⑥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 1, pp. 744—745.

⑦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 134.

⑧ Francis Hoy Kee Wong & Gwee Yee Hean (ed.), *Official Reports on Education: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70—1939*, Singapore: Pan Pacific Book Distributors, 1980, p. 5.

⑨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 1, p. 481.

对教学情况进行监督。<sup>①</sup> 海峡殖民地政府对于教育的干预变得更加直接。由于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有一套自己的传统教育体系，海峡殖民地政府尤其注重通过帝国的教育理念，规训华人子民。

### 三、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理念

19世纪以前，英国学校教授的文学课程主要是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校的时候，这两所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并没有设立“英国文学”课程和英文系。最早的“英国文学”课程设立于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和印度的大学，然后才零星地出现于英国本土的一些机械学院、女子学校、工人学院及大学附属夜校等具有中下层中产阶级和大众色彩的教育机构中。<sup>②</sup> 例如，伦敦大学直到1820年才设立英语语言文学教职。英文和英国文学在英国本土的教育机构中得到重视，是与英国的殖民扩张分不开的。武力的征服带来了文化的征服，而文化的征服又推动新的武力征服——这一循环往复的逻辑是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背景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另一重要因素是，大英帝国不得不与清政府从文化上争夺华人，来吸纳更多的华人成为大英帝国的子民（King's Chinese）开拓海峡殖民地的橡胶园和矿场，发展英国为加强东方贸易、扩张其在东方的权力所设立的“便利的货仓”。

为削减开支，183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将海峡殖民地划归印度孟加拉省管辖。海峡殖民地的教育理念也被印度殖民地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1835年，印度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他的《印度教育备忘录》中提出：要在印度国内培养一批精英，“他们有着印度人的血统和肤色，头脑里装的却是英国人的品味、思想、道德和才智。”<sup>③</sup> 这一理念被坚实地体现在1835年3月7日印度总督颁布的《印度教育决议案》中，宣布了殖民地的“英文学派”战胜了主张推行东方教育“东方学派”。<sup>④</sup> 该决议案明确宣布：英国政府的伟大目标应该是在印度人中间，推广欧洲文学和科学的传播；所有为教育目的之拨款将只被用于英文教育；今后通过英文媒介，向印度广大民众传授英国的文学和科学知识。<sup>⑤</sup> 此决议案一发布，许多海峡殖民地的英国商人纷纷支持将英文作为学校的授课语言。<sup>⑥</sup> 对于海峡殖民地学校的华人子弟来说，英文从一门促进“东西交流”的语言和课程，成为了获取“先进”知识和更多权力的手段。

从教学对象来看，海峡殖民地的英文教育主要是“精英”教育。最初，各个英式学校对教学对象的设定范围并不相同。例如，槟城义学声称学校“向所有种族和阶级的孩子开放”。而莱弗士认为，新加坡义学的教学对象应该主要是“当地贵族子弟”和东印度公司的仆从。<sup>⑦</sup> 从实际招生情况来看，由于政府给每个学校的资助额度与学生自负学费的额度成正比，所以贫家子弟入学的机会有限，海峡殖民地区域英文教育的教学对象主要是殖民政府官员、马来贵族子弟和富裕商人（包括华商）子弟。于是，能够学习英文成为了“精英”、“城市化”和权力的象征。但是，由于“精英”得到“教化”，英国文化得以通过“精英”的权力和影响自上而下地渗入马来社会。随着马来社会的发展

①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 1, p. 19.

② 程巍：《隐匿的整体》，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41页。

③ Minute by the Honble T. B. Macaulay, 2 February 1835, retrieved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website on 30 June 2019, Article 34, [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00generallinks/macaulay/txt\\_minute\\_education\\_1835.html](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00generallinks/macaulay/txt_minute_education_1835.html), 2019年9月10日。

④ Peter Wicks, Education,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a Plural Society in West Malaysia: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along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786—1874,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0, No. 2, 1980, pp. 166—167.

⑤ 耿兆锐：《19世纪殖民地印度教育体制之争》，《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67页。

⑥ Peter Wicks, Education,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a Plural Society in West Malaysia: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along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786—1874,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0, No. 2, 1980, p. 167.

⑦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p. 79.

和平民对“精英”文化的认同，在1816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到英式学校入学的中国劳工子弟的人数虽然有限，但不断升高。<sup>①</sup>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英文和英国文化的“先进性”。

海峡殖民地区域英文教育的深层目标是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权力。哈钦斯在呈送给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办学提案中陈述，槟城义学以“形成一个安静的、勤劳的、道德高尚的民族”为“学校最高的、最重要的宗旨”，因为这样会“逐渐改变当地人的性格，勤劳和有序会替代懒惰和邪恶”。<sup>②</sup>莱弗士在与传教士马礼逊的交谈中，雄心勃勃地说他想通过新加坡义学，将新加坡变为融合了重新焕发生机的土著文化和西方经济、科学、技术的文化复兴中心。<sup>③</sup>莱弗士在笔记中还提到，新加坡义校应该收集和研究当地的语言和传统，以反映当地的法律和习俗，并且“从中选取最重要的内容，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发布和流传……对人们起到指导性的作用”。<sup>④</sup>于是，海峡殖民地的土著语言和文化成了大英帝国殖民权力选择、规范和重新编辑的对象，必须“重新焕发生机”才能在新的知识体系中留存。而这一系列操作是基于大英帝国的知识和文化做出的，这自然建构了大英帝国知识和文化的“先进性”、“现代性”和海峡殖民地土著语言和文化的“附属性”、“落后性”。通过被宗主国的知识与文化“注视”和处理，海峡殖民地土著语言和文化成为了大英帝国教材中的“规训”材料。后来，许多马来人逐渐从英国人的“东方”经典中“发现”了自己的祖先是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sup>⑤</sup>并通过这样的知识认同了西方的宗主权。新加坡义校这样具有重要使命的学校，自然会受到海峡殖民地政府的重视。1870年前，全海峡殖民地的学校中，新加坡义校每年得到的政府资助最多，学生得到的政府奖学金也最多。

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发起人马礼逊在书院成立三年前时设想，英华书院的近期目标是“促进英国和以中文为书写语言的国家之间友好的文学交流”，而长远目标是“科学和天启的光芒”将“和平地、逐渐地在亚洲的边缘和太阳升起的岛屿上照亮”。<sup>⑥</sup>通过这样的话语转换，英国驾临于“以中文为书写语言的国家”之上，成为“科学”和“天启”的代言人，而华语文化地域只能成为“落后”和被启示、被领导的对象。在英华书院的奠基典礼上，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发表演说，声明书院要研究“泛恒河印度地区”的国情和语言，但是研究的重点是中国：

“中国被看做是文学和哲学思索的对象，很少为新教国家所触碰……对于英国来说，鲜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值得调查。英国的领土与中国相邻，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商业关系，这使得全面了解中国的法律、观念和习俗符合重要的政治考量……这种考量让这所低微的书院在英国的支持下拥有一个特殊的使命。”<sup>⑦</sup>

从英华书院的办学目标来看，马来亚华人和其他居住在马来亚的非欧洲族裔人被预设为二元对

---

① Lim Peng Ha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oys' and Girls' Schools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786—1941,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o. 1, 2009, pp. 60—65.

② Peter Wicks, Education,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a Plural Society in West Malaysia: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along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786—1874,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0, No. 2, 1980, p. 168.

③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67: *Indian Presidency to Crown Colony*, pp. 223.

④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p. 79.

⑤ [马来西亚] 甘德政：《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80页。

⑥ Peter Wicks, Education,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a Plural Society in West Malaysia: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along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786—1874,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0, No. 2, 1980, p. 170.

⑦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9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p. 43.

立中的“懒惰”、“无序”、“邪恶”、“神秘”的一方，必须经由“勤劳”、“有序”、“正直”的英国绅士的引导，其文化才能“焕发生机”。在帝国的办学者的设想中，英国语言将成为引导马来亚走向经济繁荣、社会有序、道德高尚的关键媒介，而他们的最终办学目的是西方文明以不过多耗费资金和人力的非暴力方式，占领马来半岛，并进一步通过“和以中文为书写语言的国家之间友好的文学交流”，侵入“傲慢无礼”、“临近最后的崩溃”的中国。<sup>①</sup> 英文教育和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权力扩张密不可分。1843年，英华书院随即迁到了英国的新殖民地香港。

在教学内容方面，海峡殖民地的英文教育除了教授英文外，还以英文为教学语言教授彰显和巩固帝国权力的课程。哈钦斯等人的槟城义学办学提案指出，“英文读写和算数的普通规律”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sup>②</sup> 虽然莱弗士曾满怀热望地预想，新加坡义学将承担融合东西文化的使命，但是这家学校严格地基于西方观念设置课程。虽然马六甲义学会用葡萄牙语、中文和马来语教授少量学生，但是这些学生在学习一段时间后，都转入英文班学习。学生会“从英文字母表学起，在课程结束后能够较好地掌握英文”。<sup>③</sup> 曾在槟榔义学担任委员会秘书近九年的槟榔屿代理殖民牧师詹姆士·麦基（Reverend James Mackay）在1868年2月20日的信中分析了英文和其他语言的不同之处：英文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脑力训练”，它是一种“活的语言”，也是“开启现代文学和科学宝藏的钥匙”。<sup>④</sup> 由此，英文就被建构成了凌驾于其他语言课程之上的“高级课程”和“必修课程”。传教士汤生（Claudius Henry Thomsen）、理雅各（James Legge）和麦都斯（Walter Henry Medhurst）编撰了多本英文词汇和对话教材，并通过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社大量印制，使这些教材被广泛地使用在海峡殖民地的学校里。这些教材后来流传到中国，成为中国基督教学校教材的原型。由此，英文课程的“高级”属性也随着大英帝国的权力扩散和印刷业的蓬勃发展迁移至中国。

海峡殖民地政府奖学金也对海峡殖民地的教育内容起到很大影响。前文提到，1863年起海峡殖民地开始设立政府奖学金。奖学金的获得者要通过一系列综合考试评选出来。综合考试的科目有英文语法、算术、几何、代数、地理、古代史、英国历史、殖民地历史、自然哲学和天文。<sup>⑤</sup> 获得奖学金不但对于学生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一种荣誉，对于海峡殖民地的学校来说也是高度肯定。因此，各个学校纷纷将教学内容围绕这些以西方知识为中心的科目展开。

海峡殖民地政府和教会开办的学校中，逐渐开设了以英文为授课语言的历史和地理课程。海峡殖民地的英文历史课本中，将海峡殖民地华人描述为“经济动物”那样的“逐利”群体，并将他们定义为反清人士和一群欣赏英国自由港体制的人，以此将华人和中国分裂开来，并将其描绘为英国的归顺者。传教士本杰明·济兹伯雷（Benjamin Keasberry）在1855年编撰的地理教程流传甚广，书中的地理知识充满了帝国主义观念。<sup>⑥</sup> 布劳特曾经正确地指出，教科书“不只是书，它们是某种文化中构造社会意见的精英的半官方宣言，这些宣言正是精英们想让这种文化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笃信

① 出自马礼逊的书信，参见〔马来西亚〕甘德政：《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71页。

② Francis Hoy Kee Wong & Gwee Yee Hean., *Perspec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isa) Ltd., 1972, p. 11.

③ Peter Wicks, *Education,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a Plural Society in West Malaysia: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along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786—1874*,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0, No. 2, 1980, p. 171.

④ Peter Wicks, *Education,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a Plural Society in West Malaysia: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along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786—1874*,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0, No. 2, 1980, p. 181.

⑤ Robert L. Jarman (ed.),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 2,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1998, p. 481.

⑥ Philip Holden, *On the Nation's Margins: The Social Place of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15, No. 1, 2000, p. 35.

的关于过去世界和现在世界的知识”。<sup>①</sup> 这种知识的核心，就是大英帝国的统治权威。虽然历史、地理课程难免涉及政治，但是它们主要介绍英国的政治史和政治概况，很少涉及政治思想。只有那些家庭优越，一直向往产生“现代知识”的“现代社会”而被送到英国的留学生（如辜鸿铭、伍连德等），才有机会深入学习哲学和政治。海峡殖民地的英文教育主要培训“一个为政府服务的聪明的、诚实的仆人种族”，<sup>②</sup> 而不是真正受启蒙的人和海峡殖民地的领导者。由此，英国文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所建构的“时间隧道”和“现代”知识和文化体系随着英文教育散播开来。在海峡殖民地社会饱受压制的华人学生热衷于追逐奖学金，也因此从知识和文化上被大英帝国争得并同化。

#### 四、海峡殖民地华人英文教育的影响

海峡殖民地区的华人英文教育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相互转化、强化和制约，塑造了符合大英帝国统治利益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它对这一区域的华人带来了深刻影响。它培养了马来群岛华人的“上层阶级”和新兴城市华人市民，使“懂英文”和“懂英国文化”成了分裂华人社群，划分马来华人社会阶级、城乡差别和权力的新标志。1869年2月23日，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发出传单，要求他们的朋友和英国人一样穿起袜子，以和“不够高贵”的“下层阶级”区分开来。如果有人在传单上签字，却又没遵守这一着装规定的话，就要被罚款30元。<sup>③</sup> 其实，很多受过英式教育的华人男子，都有在正式场合穿西服、打领结、穿皮鞋的习惯，平时也会和朋友模仿英国人打草地网球。但即使是华人“上层阶级”的“麦考利孩子们”，也仅能成为一批批懂英文的驯顺的中低级职员或公务员，而不能具有任何的更为广阔的生活观点。<sup>④</sup> 福柯曾形象地指出，各种“权力知识”在人身上的任意体现会使人划满伤痕，并更容易被重新塑造，人的有限性存在从而被抛向无限的可能，“更完美”的新个体由此诞生。<sup>⑤</sup> 于是，很多受英文教育的海峡殖民地华人成了大英帝国文化的附庸，并产生了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自卑情结，造成他们与本身文化的撕裂和历史断层。另外，英文教育的移植化和掩盖式特点，使马来地区的民族性长期迷失在放任且缺乏自我意识的发展之中。当这一民族性在摆脱殖民政权的马来半岛开始觉醒、发展时，已长期被英国文化同化的马来民族需要有新的敌人作为“他者”来将分裂的“自我”拼凑起来，华人便成为了替罪羔羊。

但是，海峡殖民地并不是英国文化任意注入的真空之地。一方面，通过西式教育获得的平等信仰与他们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遭遇的障碍之间的对立，使一些受过海峡殖民地英文教育的华人学徒感到失望和怨恨，并进行反抗。<sup>⑥</sup> 辜鸿铭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在海峡殖民地和英国本土接受了英文教育后，却发现“现代知识”赋予自己的理想不能在海峡殖民地的低层官职上实现，遂毅然回到了中国，做起了中国文化的护卫人。但是，由于这些转向中国文化的华人的活动区域在中国，他们对马来地区的影响被削弱了。另一方面，马来亚华人的英文变得驳杂而“不纯正”，充满了对宗主国语言的杂糅、戏仿，甚至是颠覆的创作。<sup>⑦</sup> 至今，融合了马来语、福建方言和英语的客客话仍然在海峡殖民地华人中流传。这些因素塑造了海峡殖民地华人复杂的身份认同——在政治、文化和民族

---

① James Morris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3, p. 6.

② Lim Peng Ha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oys' and Girls' Schools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786–1941*,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o. 1, 2009, p. 58.

③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 153.

④ 王赓武：《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的华人教育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3期，第68页。

⑤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lan Sheridan (translat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103.

⑥ 程巍：《辜鸿铭的受辱：民族主义与创伤记忆》，《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41页。

⑦ [美]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第6页。

三个方面，他们的身份认同都具有双重性甚至三重性。在这种认同中成长起来的帝国子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英华书院的毕业生何汉（Ho Han）担任英国海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翻译，代表大英帝国与清政府谈判。书院的另一位毕业生何神启基于英国的“现代”知识，成为香港华人西医书院的奠基人之一，并培养出了学生孙中山。<sup>①</sup> 海峡殖民地华人身份认同的多重性，至今还影响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和它们对中国与中国政治、文化的认知。

由于中国并非处于殖民世界之外，而只是非洲、南美洲、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出现的不完全殖民形式的一个变化形态，<sup>②</sup> 海峡殖民地区域的英文教育对于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海峡殖民地的英文教育在大英帝国的殖民权力之下，通过不断的想象与重复，建构了英国殖民活动的“神授”性，英国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先进性”，英国人的“高贵感”和英国社会的“现代性”，并由此建构了一套影响中国人和中国“现代”意识和历史进程的知识体系，通过传教士的传道、贸易的开展、印刷术的发展和大英帝国的华人子民的迁徙渗透给中国。这一知识体系通过“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sup>③</sup> 为19世纪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扩张提供了所谓的正义性，由此为英国在亚洲的侵略和扩张争得了更多的权力，并深远地影响着当今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关系。

本文作者：杨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龚赛红

## Cultivating “King’s Chinese”: the Rise, Concept and Influence of English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16-1870)

Yang Bo

**Abstract:** At its birth, English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as filled with the “discipline” of British Empire’s power. It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nvergence, divergence and changes of Chinese and British knowledge, as well as eastern and western knowledge. Thus it had established the “divinity” of British colonial activities, formed the “advancement” of British language, knowledge and culture, built British people’s “nobleness” and British society’s “modernity”. As a result, it had constructed a set of knowledge system which had influenced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and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China, gained more power for Britain’s invasion and expansion into Asia, moulded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and constr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Keywords:**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Chinese; English education

①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9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p. 194.

②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N. 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

③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 161.